・新聞學研究・　第一六九期
2026 年 10 月　頁 1-54　研究論文

防疫政治看門狗：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COVID-19 記者會之記者提問強勢性[*]

江靜之[**]

投稿日期：2025 年 12 月 3 日；接受刊登日期：2026 年 4 月 14 日。

[*] 本文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政治記者會與新聞報導中的看門狗：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COVID-19 記者會為例》（計畫編號：112-2410-H-004-066-MY2）之部分研究成果。作者感謝匿名評審的寶貴意見與建議，以及《新聞學研究》編委會之協助。

[**] 江靜之為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教授，e-mail: morecc@nccu.edu.tw。

本文引述格式：
江靜之（2026）。〈防疫政治看門狗：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COVID-19 記者會之記者提問強勢性〉，《新聞學研究》，169，1-54。https://doi.org/10.30386/MCR.202610.0015

《摘要》

本研究針對 2020 年 1 月中旬至 2022 年 7 月中旬之 COVID-19 CECC 例行記者會，透過「強勢型提問」分析系統，使用內容分析法，以記者會隔天的《中國時報》、《自由時報》及《聯合報》三大報頭版相關新聞作為取樣標準，共蒐集 214 場，含 7,921 個問題，研究記者在跨越不同疫情時期之提問強勢程度，以及其與問題功能、內容主題、引述來源及同業代問之關係，藉此一探記者如何發揮新聞的看門狗功能。首先，本研究發現記者提問的強勢性與疫情嚴重程度成正比，即記者提問強勢性於「三級警戒」最高，「二級警戒」次之，即使到了「放寬防疫」時期，提問的強勢程度依然高於整體平均。其次，記者提問多聚焦於事實問題，且其強勢性低於請受訪者評論或表態之問題。其三，「防疫政策」、「防疫舉措」及「染疫個案」是每日記者會初期及二、三級警戒的共同提問重點，每週記者會時期特別關注「疫情政治」，而放寬防疫時期則著重詢問「防疫舉措」的改變。最後，約兩成的問題有引述來源，且其強勢程度高於無引述來源的問題。同業代問問題在三級警戒時期的數量最多，且其整體強勢程度同樣高於非同業代問之問題。

關鍵詞：內容分析法、防疫記者會、記者提問、強勢性提問、對抗性

壹、前言

從二十世紀開始，「記者會」便被政府機關視為跟公眾溝通政策與想法的重要方法（Ekström & Eriksson, 2018）。Jacobs（2011, p. 1901）指出，「記者會」座落在那條「前、後臺之間的細窄交會線上」，既是政治人物接觸媒體及記者蒐集新聞素材之所，也是政治人物及記者展現並建構自身形象與觀點之處。整個過程如 Bhatia（2006, p. 176）所說的：「非常儀式化」，更是新聞業「可視化」（周葆華，2013）的一部分。Smith（1990, p. 65）指出，在記者會中，政治人物的主要目的為「說服」，記者的責任則是向政治人物問責，讓政治人物為其行動與政策當責。更重要的是，政治記者會內容與訪問雙方表現常成為之後新聞報導的來源與素材，擴大其影響力。

進而，就新聞研究角度來看，「記者會」提供研究者探究記者蒐集及呈現新聞之最佳場域（Godler & Reich, 2013, p. 675），尤其記者會的分析核心便是「問答結構」（Smith, 1990）。研究政治記者會中的記者提問，可深化我們理解記者如何檢視政治人物話語及行動，實踐新聞的「看門狗」（watchdog）功能（Ekström & Eriksson, 2018, p. 349），更可一窺新聞文化及其變化（Clayman et al., 2006）。

目前研究政治記者會的學術論文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卻多聚焦於美、英、瑞典及中國（如 Banning & Billingsley, 2007; Clayman & Heritage, 2002b; Clayman et al., 2006; Ekström, 2006, 2009; Ekström & Eriksson, 2018; Eriksson, 2011; Eshbaugh-Soha, 2012; Gobeil, 2010; Hualpa, 2012; Smith, 1990; Wu & Zhao, 2016; Wu et al., 2017; Yi & Chang, 2012; Yi, 2016a, 2016b），國內相對缺乏。究其原因，一來可能因我國總統未有固定召開記者會的慣例；二來政治人物召開記者會多為一次性的個別事

件，易被視為單一事件的新聞消息來源，而非獲得長期關注的公眾事件。

然而，臺灣衛生福利部因應 COVID-19 疫情，自 2020 年 1 月 22 日開始至 2023 年 4 月 27 日止，每日固定召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記者會（之後簡稱 CECC 記者會），正提供我們研究臺灣政治記者會的豐富素材。研究者可藉此一探臺灣媒體與政府的關係，分析在疫情期間，記者如何在「客觀」與「對抗」（adversarialness）的不同專業規範之間傾斜或轉換（Heritage & Clayman, 2010）。特別在疫情期間，記者會作為一種風險溝通平臺，提供研究者一探記者如何監督政府的難得管道（梁志鳴等，2024，頁 91）。

而且，就目的與功能來看，官方防疫記者會便如其他政治記者會一樣，不但是影響新聞媒體的可靠方式，更是觸及公眾的重要方法（Eshbaugh-Soha, 2013, p. 561）。因此，除了傳布防疫訊息，防疫記者會同樣可成就 Scacco & Wiemer（2019）所說的政治記者會的三個目的：第一，作為近用的機會，「記者會」以公開記錄及事先安排的方式，連結記者與官方消息來源；第二，作為策略公關的表演場合，「記者會」讓政治人物及記者建構問責及近用的社會形象；第三，作為課責的論壇，「記者會」是民主社會中，記者以看門狗角色監看當權者的一種方式，提供利害關係人觀察政府官員或政治人物如何公開回應問題的機會。

舉例來說，Aguila Sánchez et al.（2021）研究墨西哥每日防疫記者會初期的記者提問，發現新聞媒體雖不質疑記者會作為官方溝通之所，卻用之攻擊政府，有時甚至誤傳訊息與製造政治噪音，而非協助記者會實現其告知和論辯疾病與其經濟影響的目標。他們批評，墨西哥政府與媒體都使用記者會來追求自己的資訊利益，尤其媒體將焦點置於攻擊與將官員所言煽情化，以吸引更多公眾注意力。亦即，媒體更關注攻擊政

治人物，而非查證或對比資訊；更重指責，而非報導。

針對 CECC 記者會的記者提問，國內目前雖有兩篇相關研究（梁志鳴等，2024；戴淨妍，2023），但其與之前大部分政治記者會研究一樣，抑或設定一小段抽樣時間區段，蒐集相對少量的文本；抑或蒐集大量文本，卻無法聚焦於那些之後成為新聞的記者會問答內容，了解事件（如疫情變化）不同發展階段與記者提問的關係與變化。尤其記者會相關新聞引述的受訪者言談，大部分是對記者提問之回應，故以隔日 CECC 記者會相關新聞作為選樣標準，有其價值與重要性，且理應更能彰顯新聞之看門狗功能。

有鑑於此，本研究主要參考 Clayman & Heritage（2009）提出之「強勢型提問」（aggressive questioning）分析系統，使用內容分析法，研究自 2020 年 1 月 22 日至 2022 年 7 月 17 日，被《中國時報》、《自由時報》及《聯合報》三大報選取作為次日頭版新聞之 214 場每日例行 CECC 記者會。藉此，本研究聚焦於具有顯著新聞性的記者提問，分析記者使用之強勢型提問策略和強度高低，以及其與引述來源、同業代問、問題功能及內容主題等之關係，探究臺灣記者在跨不同時期的 CECC 記者會中，如何發揮看門狗功能。

貳、文獻檢閱

根據文獻（Bhatia, 2006; Craig, 2016; Ekström & Eriksson, 2018），政治記者會的言談序列通常包含開場、政治人物事先準備好的演說（the pre-planned speech）、政治人物與記者的問答時段，以及結尾。其中，問答時段可謂政治人物與記者的交鋒時刻。

不過，文獻也指出（Clayman et al, 2006; Craig, 2016; Ekström, 2009;

Eriksson, 2011），政治記者會的問答輪番系統是由回答問題的政治人物所操控，因政治人物可選擇提問的記者、決定提問順序、限定提問時間，也能限制追問。因此，記者要爭取提問機會，且因可能沒有追問機會，而偏向提問超過一個問題。當然，這不表示記者在政治記者會中總處於劣勢。Ekström & Eriksson（2018, p. 348）強調，記者透過問題索取資訊，但同時也會因此影響記者會的互動及政治表演情境。

值得注意的是，社會政治文化情境會影響記者會的問答互動，也成為研究者判斷記者對抗傾向的重要因素。例如「追問」常被視為記者對抗的指標（Clayman & Heritage, 2002b），但不同於在瑞典政治記者會，記者獲得第二次提問機會及追問的情況非常普遍（Eriksson, 2011），在中國政府記者會中，記者少有追問機會（Du & Rendle-Short, 2016; Jiang, 2006; Yi & Chang, 2012）。而在美國總統記者會中，Ekström（2009）發現總統會批評堅持追問的記者，抱怨此舉「對其他人（記者）不公平」，藉此限制記者追問。

以下針對政治記者會中的記者提問與專業規範關係，進行相關文獻檢閱。

一、記者提問的強勢性

透過研究記者在政治記者會中提問的問題，研究者能一窺記者的專業規範、實踐及其與政治人物的關係，但要如何分析？Clayman et al.（2007, p. 26）以美國總統記者會為例指出，除了少數記者偶有追問機會外，在記者會中，每個問題皆由不同記者發問，所以記者大多會事先備妥問題。在此情況下，Clayman et al.（同上引）認為，記者提問的問題各自獨立，因為不同記者提問的問題在主題上是斷裂的，而且大多不是取決於之前的問答互動。因此他們主張，研究者無須將記者提問放入

原有問答序列情境中，而是可用量化統計分析，研究記者提問的對抗性。

目前學界分析政治記者會中，記者提問的對抗性（adversarialness）或強勢性（aggressiveness），多使用 Clayman & Heritage（2002b）的美國總統記者會研究，或 Clayman et al.（2006）之後微調的分析系統（戴淨妍，2023；Banning & Billingsley, 2007; Clayman & Heritage, 2009; Hualpa, 2012; Zhang & Shoemaker, 2014）。因此，本研究以下先說明 Clayman & Heritage（2002b）提出之分析架構，再補充 Clayman et al.（2006）及 Clayman & Heritage（2009）提出之修改版本。

根據 Clayman & Heritage（2002b），對抗型提問系統包含以下四面向：

1. 主導性（initiative）：透過問題形式設下較多限制，包括：
   (1) 複雜問題：在一個發言輪（turn）中提問多個問題或在問題前先給一段「初步陳述」（preliminary statements），為問題建構情境，藉此給予受訪者壓力，顯現敵意。
   (2) 用不同版本提問同一問題（question cascades）：多用後面的問題窄化可被接受的答案。
   (3) 追問（follow-up questions），但 Clayman & Heritage（2002b, p. 758）認為「追問」並非分析記者主導性的完美指標，因記者能否追問，要視主持人是否給予發言機會。
2. 直接性（directness）：問題更直白，因此使提問更為有力。但此面向採反向測量，即觀察記者是否使用間接方式提問「非直接」問題（Clayman et al., 2006）。在記者會情境中，Clayman & Heritage（2002b）指出，「非直接」通常是在主要問題之前，使用片語、子句或句子框架問題。這些詞彙並非問題的基本要件，可顯示問題的「非直接性」，因其減緩問題的力道，讓政治人物

有機會將議題擱置一旁。Clayman & Heritage 將之分成兩類，一是指向政治人物作答能力或意願的「他人指涉問題框架」（other-referencing question frames），二是指向記者自己提問意圖、動機或能力的「自我指涉問題框架」（self-referencing question frames）。

3. 假設性（assertiveness）：問題本身已偏好或預期某種答案，因此問題已隱含意見，而非中立地尋求資訊，包括：
   (1) 前導偏向（preface tilt）：研究者可從其前導語是否論及政治人物的政治利益來看問題是否含有敵意。對此，Clayman & Heritage（2002b）為了簡化過錄工作，將之聚焦於 yes/no 問句。
   (2) 負面問題（negatively formulated questions）：此類問題通常以否定句如 “isn’t it”、“aren’t you” 或 “don’t you think about” 開頭。
4. 敵對性（hostility）：批判政治人物或其行政團隊。不同於前三個面向著重於問題形式，此面向較關注問題內容，並被細分為：
   (1) 前提敵對性（preface hostility）：在問題前的陳述中，指出政治人物的政策錯誤、強調其言行不一、凸顯其團隊內部分裂、直接反對受訪者所言，或要求政治人物對自己採行的某個政策或行動提出合理解釋等。
   (2) 問題整體敵對性（global hostility）：即前提與問題皆含敵對性。
   (3) 課責型問題（accountability questions）：要求政治人物解釋為何採行某政策或某項行動。此類問題暗指政治人物的行為可能不恰當，使得政治人物須為自己辯護。此類問題可再區分為「你怎麼能-類型問題」（a how could you-type question）及「為什麼你-類型問題」（a why did you-type question），前

者敵對程度高於後者。

之後，Clayman et al.（2006, p. 563）主張「強勢型專業主義」（aggressive professionalism）存於語言與論述細節中，不但涉及記者問甚麼問題，也涉及以何種方式提問，會對政治人物形成不同程度的壓力與限制。故此，他們將「對抗型提問」分析系統改名為「強勢型提問」，並將第四個面向「敵對性」改為「對抗性」。之後，Clayman & Heritage（2009）沿用強勢型提問分析系統（見表 1），除了保持「對抗性」面向名稱，另將「對抗性」面向的「課責型問題」指標獨立出來，成為五大面向：（1）主導性、（2）直接性、（3）假設性、（4）對抗性、（5）課責。前三者聚焦於問題形式，後兩者著重問題內容。

表 1：Clayman & Heritage 的強勢型提問分析系統

面向	指標	定義	指標值
主導性	初步陳述	問題前有段陳述	0 無／1 有初步陳述
	多個問題	一個發言輪含至少 2 個問題	0 單一問題／1 多個問題
	追問	同一記者之後提問之問題	0 無追問／1 有追問
直接性	沒有指涉他人	指向受訪者作答的能力或意願	0 無框架／1 Can you／2 Will you
	沒有指涉自己	指向訪問者提問的意圖或期望	0 無框架／1 I wonder／2 I'd like to ask／3 Can／May I ask
假設性	前導偏向	前言偏好「是」或「否」	0 無前言／1 對受訪者無害／2 對受訪者不利
	負面問題	Isn't it…?/ Couldn't you…?	0 無／1 有負面問題
對抗性	前提對抗	問題前提具對抗性	0 無對抗前言／1 問題的對抗前言／2 預設的對抗前言
	整體問題對抗	問題整體具對抗性	0 無／1 有整體對抗
課責	課責型問題	尋求解釋行政政策的問題	0 無課責型問題／1 Why did you／2 How could you

資料來源：“Question design as a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window into president-press relations (p. 304),” by S. Clayman & J. Heritage, 2009, *Talk in interaction: Comparative dimensions*, Finnish Literature Society.

二、記者提問強勢性與文化情境

記者提問的強勢性與新聞專業規範有關，不但會跨時變化（Clayman et al., 2006; Clayman & Heritage, 2009; Clayman et al., 2010; Heritage & Clayman, 2010; Wu et al., 2017; Wu & Zhang, 2018），也深受文化情境影響。舉例來說，Eriksson（2011）分析瑞典 2009 年政府記者會，發現瑞典記者與政治人物之間的關係較為友善、較不強勢，不同於美國的新聞文化。他認為這可能有三種解釋：第一，記者會讓記者能獲得關於政策、評估等更詳細與有效的資訊，也讓政治人物為其言行負責。雖然 Eriksson 認為若過於強調後者，可能妨礙記者完成前項任務。第二，在瑞典，政府記者會除非新聞直播，否則通常不會有大量觀眾，因此記者較無扮演「辯證者角色」（the devil's advocate role）的壓力。第三，在政府記者會後，記者有私下訪談政府官員的機會，為了獲得獨家新聞，記者可能不想公開提問某些具挑戰性的好問題。

此外，Gobeil（2010）使用 Clayman et al.（2006）提出之分析指標，研究自 2002 年 6 月至 2009 年 6 月間，美國總統及英國總理個人記者會共 53 場，2,417 個問題。他發現英國媒體並未表現出更高程度的強勢型提問，也不如一般預期地採對抗的「攻擊狗」（attack dog）模式。另方面，儘管美國媒體常被批評服膺政府利益，但在記者會中，強勢型提問卻持續成長，且記者提問展現出相當的敵意，更勝英國。值得注意的是，Gobeil 指出，雖然英、美兩國皆使用英文，但兩國的演說文化有異，而這可能與研究者判斷問題的強勢性有關，建議未來研究應釐清其中差別。

尤其研究使用不同語言的政治記者會，研究者必須依當地語言及文

化情境修改分析指標。以中國政治記者會為例，Sun（2010）使用 Clayman & Heritage（2002b）的分析架構，研究 10 場由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辦的記者會。在分析指標上，Sun 做了以下修正：（1）前測發現「用不同版本提問同一問題」、「負面問題」及「前言敵對性」在中國記者會中不顯著，將之刪除；（2）從資料中發現並新增兩個新指標，分別是在「直接性」面向納入「目標導向提問」（target-oriented questioning），意指以高度目標導向的方式形成問題，例如界定問題範圍或針對受訪者個人的批評等），以及在「假定性」面向納入「問題偏向」（question tilt）；（3）“would you” 翻譯成中文為「你會」，並非特別有禮。因此，除非句中包含「您」，否則言者並未較有禮貌；（4）將「追問」定義為接續其他記者問答內容所提之問題。

使用前述修正後的分析指標，Sun（2010）研究記者會上中國與外國記者提問的問題。其研究發現：（1）在主導性上，雖無記者獲得第二次提問機會，但外國記者「追問」比例高於中國記者；（2）在直接性上，外國記者使用較多「指涉自己的問題」，例如以「我現在想知道」直接提問，增加受訪者作答壓力；中國記者使用較多「指涉他人的問題」。而且，外國記者比中國記者使用更多「目標導向問題」；（3）在假定性上，外國記者比中國記者提問更多假定問題，且多採取「問題偏向」，大部分使用中文的「會不會」句法；（4）在敵對性上，Sun 的分析資料只出現「問題整體敵對性」及「課責型問題」，且多由外國記者提問。而且，僅有 3 個中國記者提問的問題隱含負面評論，且未有中國記者提問課責型問題。

另外，Du & Rendle-Short（2016, p. 53）研究自 1998 至 2014 年間，16 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記者會中，中國與外國記者提問的問題。Du & Rendle-Short 同樣根據個案特質，修改 Clayman et al.（2006）提出的分析指標如

下：（1）由於記者無追問機會，且主題眾多，須在提問前詳細陳述問題的背景資訊，故他們刪除「追問」及「初步陳述」兩項指標；（2）由於中文尾音上揚的「直述句問題」（declarative questions）主要在陳述而非提問，故將之視為一種「對抗提問」；（3）對於「直接性」面向的「指涉自己的問題框架」，他們認為使用「能力」（如「我能（Can I/ May I）」）比「意圖」（如「我想問（I'd like to ask/ I want to ask）」）的尊敬程度高。同時，納入中文有尊敬之意的「請」字。而 Zhang & Shoemaker（2014, p. 114）認為問題中加入「請」字是有禮或尊敬對方的表現，故也在「直接性」面向中，增加一個以「請問」為開頭的指標，亦即未使用「請問」將被視為「直接」。

Du & Rendle-Short（2016, p. 53）發現外國記者提問的對抗性明顯高於中國記者，且兩者只在負面問題、課責型問題、直述句問題及指涉他人的問題上，無顯著差異。外國記者較會提問有政治衝突性的主題，並在問題前提中納入有強勢性的陳述，且偏好使用預設答案類型的 yes/no 問題。中國記者則較外國記者恭順（deference），他們認為這可能源於中國文化強調和諧，以及中國政府對國內媒體的嚴格監管規定。整體言之，中國政治記者會便如 Jiang（2006, p. 241）研究中國外交部記者會所發現，記者與政府官員通常嚴守「一問一答」的問答序列，鮮少出現打斷或追問，因此記者重新闡述問題（question reformulations）的現象較為普遍。

三、記者提問功能與主題

新聞訪問者的提問具多種功能，包含框限受訪者回答的主題範圍、給予不同的作答空間，及引導受訪者的言談行動（Clayman & Heritage,

2002a, pp. 196-102）。而且，記者提問內容也會因記者會主題而變。因此，雖然「強勢型提問」分析架構提供我們一窺在政治記者會中，記者提問的整體對抗或強勢程度，但本研究認為，應再納入記者提問的功能與主題分析，方能切合 CECC 記者會的特殊情境。

（一）記者提問的問題功能

目前關於政治記者會中，記者問題功能的研究屈指可數。Smith（1990）從語藝角度對美國總統記者會進行批判分析研究，著重媒體對總統的課責，因「問題」顯露並實踐了記者向總統課責的策略（p. 93）。Smith 指出，辨識問題類型要問的是：「這個問題尋求甚麼類型的答案？……答案是問題作用的結果。」（p. 107）因此，當 Hualpa（2012, p. 33）批評 Smith 對記者問題的分類主要聚焦於問題「內容」，不像 Clayman 等人同時考量「形式」時，顯然忽略 Smith 其實是以問題「功能」作為區分標準。

Smith（1990, pp. 94-107）將美國總統記者會的記者提問，依尋求不同的答案類型，分成以下七類：

1. 態度問題（尋求一段關於態度的陳述）：詢問總統對某事的態度，讓總統闡述他／她的一般想法或世界觀，而非詢問總統的政策承諾或採取的行動。
2. 一致性問題（尋求對不一致性的解決之道）：要求總統回答自己或其行政團隊言行不一的問題，例如：「你會做你說你要做的事情嗎？」
3. 要求新資訊（尋求對政策或行動的陳述）：此類問題通常使用「甚麼」及「何時」開頭（what and when questions），直接詢問總統對某政策或行動的承諾。

4. 為留下記錄而問的問題（尋求政策或行動陳述）：此類問題雖形似「要求新資訊」，但其功能在於迫使總統公開自己的立場，使其在未來對自己所言負責或提醒閱聽人。
5. 倡議立場的問題（對記者倡議的陳述表達同意或不同意）：此類問題是記者為了表達自己倡議的立場而提，所以大部分時候，記者會先用一段長論述敘述自己立場，再問問題。
6. 攻擊性的問題（尋求對攻擊的回應）：此類問題一方面算是「一致性問題」或「為記錄而問的問題」，但語氣（tone）不同。亦即記者在討論的議題上有個人觀點，而且認為總統的觀點完全錯誤。近似「倡議立場的問題」。
7. 追問（尋求闡述或澄清之前的答案）：Smith 認為，只有針對前一個問題的回答提問，才是追問，包含請總統澄清、闡述及追問一致性。

此外，Jiang（2006）分析比較美、中政府記者會，將記者在會中索取資訊的問題，依功能再區分成四類：「索取具體資訊」、「要求澄清」、「要求確認」及「要求評論」。她發現無論在美國或中國記者會中，記者提問的問題超過七成皆為「索取具體資訊」。此外，Jiang 指出，美國記者會中，記者「要求澄清」與「要求確認」的問題數量多於中國記者會，顯示美國記者認為政治人物的回答不夠清楚，所以需要更多資訊，或確定自己該如何詮釋之。但在中國記者會中，記者較少提問有損受訪者面子的「要求澄清」與「要求確認」問題，反而較常使用不會冒犯或挑戰受訪者的「要求評論」問題。對此，Jiang 提醒，「要求評論」問題偏向索取「意見」，而非「事實」，這讓受訪者可以提供較不具體且較難被破解的，模糊、一般化的意見。有趣的是，Du & Rendle-Short（2016）也發現，雖然中國記者在記者會中也會問及中國

社會問題或不佳的經濟情況，並在問題前隱含不利於官員的前提（unfavorable prefaces），但卻是詢問官員的評論，而非將之合併在 yes/no 問句中，向政治人物施壓。

（二）防疫記者會的記者提問主題變化

Aguila Sánchez et al.（2021）研究墨西哥政府的每日防疫記者會，蒐集自 2020 年 2 月 29 日至 4 月 20 日，處於疫情開始不確定與鮮少計畫的兩個階段，共 51 場記者會，包含 738 個問題。其研究發現，記者提問內容最多涉及政府危機管理的問題（56%），其次為疾病統計（24.3%）、溝通與健康教育（19.1%）、疾病特徵（18.3%）、政治與官場（14%）、風險與脆弱性（9.2%），以及經濟影響（4.7%）。其中，第一階段問及「危機對經濟的影響」的比例（74.3%）遠大於第二階段（25.7%）；「風險與脆弱性」的比例分布則第二階段（72.1%）大於第一階段（27.9%）。而且，記者問題與主題多樣性隨時間增加。

此外，Aguila Sánchez et al.（2021）發現有五成關於「政治與官場」的問題使用煽情的語氣，而且，向其他祕書處人員提問的問題中，有四成涉及「政治與官場」。而「疾病統計」問題則在當天記者會主題、過去 24 小時發生的事件、重複的問題，以及與社會相關的問題上，都占有兩至三成的比例。

在臺灣，戴淨妍（2023）將 2020 年 1 月 22 日至 2022 年 10 月 12 日劃分成疫情三階段，各抽 4 週 84 天記者會，共 1,827 個提問。研究發現前五大主題依序為：疫苗施打採購研發（35.1%）、國內病毒感染管控（10.7%）、航空公司與機組員（7.2%）、醫療機構醫護人員（6.2%）及邊境管控（5.9%）。進而，戴淨妍參考前述 Aguila Sánchez et al.（2021）研究，提出六個提問框架，發現「政府危機管理與責任歸屬」

框架占比最大（51%），其次分別為「疾病特徵、發展與統計」（22%）、「社會風險與脆弱性、傳播與健康教育」（15.4%）、「政治與官僚主義」（6.2%）、「人性化的個案問題」（2.7%）與「謠言、感官化與娛樂化」（2.6%）。

另外，戴淨妍（2023）發現「政府危機管理與責任歸屬」與「疾病特徵、發展與統計」數量在疫情第二階段（2021 年 4 月 20 日至 2022 年 2 月 28 日）高於其他兩階段，但「社會風險與脆弱性、傳播與健康教育」卻低於其他兩階段。至於「人性化的個案問題」及「謠言、感官化與娛樂化」主題框架，則在臺灣尚未爆發大規模本土確診個案的疫情第一階段占比最高，而「政治與官僚主義」雖占比較低，卻較第二、三階段展現較強「臺灣主體性」（頁 53）。

梁志鳴等（2024）則聚焦於 2021 年 5 至 7 月三級警戒期間舉辦的 CECC 記者會，以隔日取樣獲得 37 場記者會，1,432 個問題。其研究發現記者提問的內容主題，數量分布從高至低依序為疫情監控（466 次）、疫苗施打（453 次）、全民防疫（257 次）、疫苗取得（224 次）、醫療能量（109 次）及其他（41 次），其中前兩大主題合計已近六成。前五個主題在三級警戒的前中後三期，「疫情監控」與「醫療能量」數量逐漸下降，「疫苗施打」集中於中、後期，「全民防疫」及「疫苗取得」則分布較平均。

進而，梁志鳴等（2024）分析發現，記者發揮公共問責功能的方式有三：（1）要求政府說明或釐清管制規則內容及理由，此類數量最多，其中「全民防疫」中「行為指引」及「疫苗施打順序或類別」主題最為顯著；（2）關注政府執法情形和裁罰標準，特別是「全民防疫」下的行為指引，以及「疫苗施打」的順序問題；（3）挑戰政府違法或法律依據不明，尤其是「疫苗取得」下的民間捐贈問題。

最後，CECC 記者會在 COVID-19 疫情期間，成為記者固定獲取 COVID-19 相關醫療與健康資訊、國內外疫情發展、政府防疫資源分配、防疫政策制定與施行等權威管道。這些涉及專業醫學、醫療判斷與公共健康之議題，使得記者提問是否引述消息來源，以及引述之消息來源類型，成為值得關注的研究焦點。例如梁志鳴等（2024）發現在三級警戒期間，記者在 CECC 記者會中提問的問題有 49% 提及資訊來源，51% 沒有提及。Aguila Sánchez et al.（2021）研究墨西哥政府的每日防疫記者會則發現，三分之一的問題含有經查證的消息來源，各有約兩成四的問題與當天記者會開場所言的主題有關，以及與過去 24 小時的事件有關。僅有 4% 的問題暗指謠言，請現場官員澄清或予其發聲機會。

而陳秀鳳與劉蕙苓（2024）研究 CECC 記者會直播中的網友發言與記者提問之關係，發現受訪記者為避免網友批評，除了提問時修飾尖銳的問題，以及不主動說出自己所屬媒體與姓名外，也會「委請同業幫忙提問」（頁 68）。值得注意的是，過去分析政治記者會中記者提問強勢性的實證研究未曾提及此類問題，而此類幫同業代問的問題，其攻擊性是否會高於自己提問之問題，也是值得分析的重點。

四、小結

綜合前述文獻檢閱可知，「強勢型提問」分析系統由多重提問策略指標所構成，一般被用於分析政治記者會的記者提問。因此，本研究用之分析記者在 CECC 記者會中的提問強勢性，首先須視中文語境特質及本土社會文化情境之不同，修訂分析指標。其次，本研究考量 CECC 記者會不同於一般政治記者會的特殊性，即其因 COVID-19 疫情而起，主要目的為「建立透明、即時、專業的媒體溝通平臺及輿情監測回應機

制」[1]，故本研究主要比較記者提問強勢性在不同「疫情發展時期」之強弱變化。進而，本研究根據相關文獻與本研究蒐集之 CECC 記者會個案資料特質，增加提問功能、內容主題、有無引述消息來源及同業代問等關鍵變項。依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六大研究問題：

RQ1：記者提問之「整體強勢性」各面向間是否有顯著差異？

RQ2：不同「疫情發展時期」之記者提問在「整體強勢性」及其各面向上，是否有顯著差異？

RQ3：「同業代問」之問題在不同「疫情發展時期」之分布為何？以及其與「非同業代問」之問題整體強勢性是否有顯著差異？

RQ4：不同「問題功能」之記者提問在「整體強勢性」及其各面向上，是否有顯著差異？

RQ5：記者提問「有無引述來源」、「引述來源數量」在問題「整體強勢性」及其各面向上，是否有顯著差異？以及，引述之「消息來源類型」分布狀況為何？

RQ6：記者提問之「內容主題」在不同「疫情發展時期」、「整體強勢性」各面向、「有無引述來源」，以及「同業代問」上的分布狀況為何？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奠基於 Clayman et al.（2006）提出之「強勢型提問」分析系統，結合國內外相關文獻與 CECC 記者會個案特質，採內容分析法，研

[1] CECC 記者會目的參見衛福部官網說明：https：//covid19.mohw.gov.tw/ch/cp-4826-53649-205.html

究 CECC 記者會中，記者提問之主題、問題功能及整體對立或強勢偏向。

一、資料蒐集

本研究蒐集資料範圍從 2020 年 1 月 22 日第一場 CECC 記者會開始，至 2022 年 7 月 17 日，陳時中擔任衛福部長與防疫指揮官的最後一日為止，並排除 CECC 因應突發狀況舉辦之臨時記者會。本研究認為這段期間包含主要疫情發展與 CECC 每日例行記者會之重要變化，已提供足夠的分析資料。

本研究依 CECC 記者會傳達之重要疫情訊息，進行立意抽樣。亦即，本研究查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及《聯合報》三大報頭版新聞，[2] 凡在上述資料蒐集期間，三大報同時將前一日 CECC 記者會當成頭版新聞之主要消息來源，表示該記者會內容具高度新聞價值，故無論媒體立場為何，皆選擇將之當成頭版新聞。依此標準，本研究共得 215 天記者會。接著，本研究透過 YouTube 平臺「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頻道」，蒐集前述 CECC 記者會直播影音檔。在這 215 天中，有 9 天的記者會影音檔未能在 YouTube 平臺尋得。另有 11 天出現 2 場，以及 1 天出現 3 場記者會，本研究從中選取含完整開場白、問答及結尾的記者會。最後本研究共蒐集 214 場 CECC 記者會影音資料。

214 場記者會影音資料，本研究先使用 YouTube 即時字幕文字稿，或透過自動轉錄軟體 Good Tape 將之轉成文字稿。接著，研究人員觀看影音檔，確認記者會問答環節的轉錄文字內容的正確性、對文字稿進行

[2] 《蘋果日報》於 2021 年 5 月 18 日停止紙本發行，故本研究僅參考三大報之頭版頭條新聞。

斷句處理，並在文字稿中註明發言官員身分及提問記者所屬之媒體組織。

二、分析步驟

本研究的分析單位為記者會問答環節中，記者提問有完整問句或可辨識獨立提問內容之問題，故記者的每個發言輪可能包含一個以上的「問題」。本研究蒐集 214 場記者會，共有 3,982 個發言輪，7,921 個問題。其中，38.2% 發言輪僅提一個問題，37.2% 提兩個問題，15.9% 提三個問題，5.9% 提四個問題，1.8% 提五個問題，以上共占 99.1%。在本研究中，一個發言輪最多含有 9 個問題（0.1%）。

本研究主要參考 Clayman et al.（2006）提出之「強勢型提問」分析系統，再根據前述相關文獻、中文特性，以及 CECC 記者會個案性質，修改並建立本研究分析系統，說明如下：

第一，「強勢型提問」包含主導性、直接性、假設性、對抗性、課責五大面向。對此，本研究修改如表 2，並說明如下：

（1）根據之前文獻，「主導性」的「追問」指標不一定會出現在記者會中，但因 CECC 記者會允許記者追問，且追問不限於記者自己提問之問題，故本研究保留此指標，並將之定義為「針對之前問題進行追問」。

（2）「直接性」修改有二，一是因應中文特性，將指涉框架指標改為「直／間接問句」，其中直接問句的直接性高於間接問句（江靜之，2003，2009）；二是增加包含您、請、不好意思或謝謝等「禮貌用語」，而未包含「禮貌用語」的問題被視為「直接」。

（3）在「假設性」中，本研究過錄「前導偏向」時參考 Clayman et

al.（2006），分為無前導、無前導偏向、對受訪者無害、對受訪者不利四類。不過，本研究過錄完畢發現「對受訪者不利」僅占3.1%，故將之與「對受訪者無害」（5.8%）合併，成為「有前導偏向」。如以下提問被歸為有前導偏向：「那請問一下說，因為義大利剛剛有說包括中國、中港澳或臺北的班機都必須要停飛，那就有報導說，顯示說這應該是義大利在一個中國原則之下，把臺灣納到中國一部分，我不知道這部分我們疫情中心怎麼樣去看待」（CECC 記者會，2020 年 1 月 31 日）。此外，本研究刪除以（英文）句法作為判斷的「負面問題」指標，並增加「直接問句預設」指標，因中文直接問句隱含之預設強度不同，從高至低依序為直述問句、附加問句、語助詞問句、正反問句（江靜之，2003，2009）。

（4）將著重問題內容的「對抗性」與「課責」面向合一，並以前者作為面向名稱。其中，「有無對立」在過錄時分為：中立、前提對立、問題對立、前提與問題皆對立、前提有利受訪者、問題有利受訪者，以及前提與問題皆有利受訪者。之後為分析所需，本研究將中立及有利受訪者之問題歸為「無對立」，其他含對立前提與問題者視為「有對立」。例如以下提問因前提對立，故被歸為有對立：「有醫生預估這波的國內確診可能會多達 100 萬人，指揮中心怎麼看？」（CECC 記者會，2022 年 4 月 15 日）。此外，原「課責」指標乃針對政治記者會中「尋求解釋行政政策的問題」，不完全適用於 CECC 記者會，故本研究參考 Smith（1990），將之定義為包含以下功能之問題：「為留下記錄而問的問題」、「一致性問題」、「倡議立場的問題」或「攻擊性的問題」，並將指標重新命名為「批判型問題」。例如以下提問被視作「為留下記錄而問的問題」：「有醫師建議用快篩取代 PCR 作為工具，請問指揮中心認為適當嗎？」（CECC 記者會，2022 年 4 月 24 日），故最終被歸為「批判型問題」。

表 2：本研究強勢型提問分析系統

面向	指標	定義	指標值
主導性	初步陳述 多個問題 追問	問題前有段陳述 一個發言輪含至少 2 個問題 針對之前問題進行追問	0 無／1 有（初步陳述） 0 單一問題／1 多個問題 0 無／1 有（追問）
直接性	間接／直接問句 有無禮貌用語	問題使用直接或間接問句 問題是否包含禮貌用語，如您、請、不好意思或謝謝	0 間接問句／1 直接問句 0 有／1 無（禮貌用語）
假設性	前導偏向 直接問句預設	有無前言偏向 含預設強度之直接問句，如直述問句、附加問句、語助詞問句、正反問句	0 無／1 有（偏向） 0 疑問詞或選擇問句／1 正反問句／2 語助詞問句／3 附加問句／4 直述問句
對抗性	對立 批判型問題	問題前言或內容是否有對立 問題是否為「留下記錄而問的問題」、「一致性問題」、「倡議立場的問題」或「攻擊性的問題」	0 無／1 有（對立） 0 否／1 是（批判型問題）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第二，除了上述「批判型問題」包含之問題功能，本研究參考 Smith（1990）及 Jiang（2006），將問題功能另分為要求新資訊、要求闡述、要求態度陳述、要求澄清、要求確認、要求評估或評論、要求建議，以及其他。過錄完畢，研究者排除涉及內容的「批判型問題」與「其他」類別後，依問題功能相似性與數量，重新歸納為以下五類：「要求新或具體資訊」、「要求態度陳述」、「要求確認或澄清」、「要求評估或評論」及「要求建議」。

第三，研究者根據個案資料，歸納 28 個主題內容，再根據過錄結果，劃分為以下九大類主題（複選，至多選三項）：（1）醫學知識：

與 COVID-19 相關之醫學問題或研究；（2）防疫政策：包含警戒等級、社交距離設定等之政策擬定、施行或改變；（3）防疫舉措：含檢測、篩檢、疫苗施打或隔離等細項措施之施行；（4）本土疫情：包含疫調資料及疫情掌握情況等；（5）染疫個案：包含染疫個案判斷、情況或相關處理等；（6）疫情政治：涉及國際、兩岸或中央與地方關係之疫情處理或管制措施等；（7）防疫物資：與補助金或物資相關之來源、捐贈、分配或使用等；（8）醫療體系：包含醫療量能或醫事人員等相關問題；（9）宣傳溝通：含防疫宣傳、記者會或官員個人相關問題。

最後，除了以上類目及個案基本資料（含日期、記者所屬媒體類型），本研究另列「有無引述來源」、「引述來源類型」及「是否為同業代問」三項類目。其中，「是否為同業代問」乃以提問記者自己於提問中的說明，作為判斷標準，例如：「另外想要代同業詢問」、「幫同業提問一題」或「代 OO（媒體名稱）提問」。

進而，本研究依疫情與防疫措施發展，將個案資料劃分成以下五個時期：（1）每日記者會開設初期（以下簡稱「每日記者會初期」）：自 2020 年 1 月 22 日開始舉辦每日記者會至 6 月 6 日，以及 2021 年 1 月 12 日至 5 月 10 日，恢復每日記者會召開；（2）每週記者會時期（以下簡稱「每週記者會」）：因初期疫情趨緩，2020 年 6 月 7 日至 2021 年 1 月 11 日，每日記者會改為每週三舉辦；（3）全國二級警戒時期（以下簡稱「二級警戒」）：自 2021 年 5 月 11 日至 5 月 18 日，以及 2021 年 7 月 27 日至 2022 年 2 月 28 日止；（4）全國三級警戒時期（以下簡稱「三級警戒」）：自 2021 年 5 月 19 日至 7 月 26 日止；（5）放寬防疫措施時期（以下簡稱「放寬防疫」）：自 2022 年 3 月 1 日適度放寬防疫措施，至當年 7 月 17 日，本研究蒐集資料截止日。

研究者與三位修畢研究方法課程之碩士生透過兩場研究會議，討論

以上類目定義，並進行編碼訓練。之後隨機抽出 20 個個案，由三位碩士生擔任編碼員，進行編碼員內部信度分析。這 20 個個案共界定出 891 個問句（占所有問句分析單位約一成）。三位編碼員對「追問」、「前導偏向」、「有無對立」、「問題功能」及「內容主題」的內部信度皆高於 0.9，符合內容分析信度的要求。

最後，本研究將「強勢型提問」四個面向進行信度分析，發現「主導性」與「直接性」的 Cronbach's α 係數為負值，「假設性」與「對抗性」的α係數也僅約0.2，顯示各項指標之間呈現負相關或低共變異數。換言之，此一結果反映了記者在實務操作上會交替運用不同策略，甚至產生相互抵消整體強勢程度的情況，例如記者可在「主導性」策略中擇一而行，或以禮貌用語減緩直接問句的直接性。事實上，這也正展現記者提問是個複雜的語言行動，其策略指標並非反映某一潛在特質，而是在不同情境下的差異化使用，甚至策略指標可能產生相互制衡的效果。因此，本研究根據前述文獻檢閱與實務觀察，主張「強勢型提問」四個面向乃由這些形成性指標（formative indicators）所組成，故不採加總評分法，而改採平均數法，建構各面向分數。此外，考量各項指標變異範圍不同（例如「直接問句預設」變異區間為 0-4 分，而「前導偏向」為 0-1 分），本研究先將指標轉換為標準化 Z 分數，以確保各策略指標在權重均衡的基礎之上，再取平均。

肆、研究發現

一、提問的整體強勢性

就提問整體強勢性的四個面向分別來看（見表 3），首先，在「主

導性」上，56.6% 的記者提問含「初步陳述」，且超過六成的發言輪包含一個以上的「多個問題」，但「追問」比例僅5.5%。不過，本研究透過卡方分析發現，「追問」與「初步陳述」（$\chi^2(1)=101$, $p< .001$）、「多個問題」（$\chi^2(1)=545.03$, $p< .001$）皆有顯著相關：追問使用單一問題的比例（62.3%）高於多個問題（37.7%），但其含初步陳述的比例（33.3%）低於不含初步陳述者（66.7%）。這乃因「追問」多衍自之前的問答情境，使用單一問題較易聚焦，且較無須再做陳述。此外，「初步陳述」與「多個問題」也有顯著相關（$\chi^2(1)=11.31$, $p< .01$）：含多個問題的發言輪，其使用初步陳述的比例（79.5%），遠高於單一問題（20.5%），因記者較易從「初步陳述」中發展多個問題。

其次，在「直接性」上，60.5% 的問題是直接問句，但含有禮貌用語的問題比例（59%）高於未含禮貌用語者（41%）。而且，「直接或間接問句」與「有無禮貌用語」有顯著相關（$\chi^2(1)=460.93$, $p< .001$）：直接問句未含禮貌用語的比例（50.6%）高於間接問句（26.3%），顯示記者使用直接問句時，較少使用禮貌用語，因此也強化提問的直接性。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前述60.5% 的直接問句中，約八成三出現在至少包含兩個問題的發言輪中，故禮貌用語可能出現在同一發言輪的其他問題中，因此降低了直接問句含禮貌用語的比例。因此，本研究進一步分析僅含單一問題的1,523 個發言輪，發現直接問句比例（54.4%）高於間接問句（45.6%），且「直接或間接問句」與「有無禮貌用語」同樣有顯著相關（$\chi^2(1)=125.23$, $p< .001$），即直接問句無禮貌用語的比例為44.8% 高於間接問句的 17.8%。

其三，在「假設性」上，含初步陳述的 4,486 個問題中，僅 15.6% 的問題陳述有偏向；而 4,791 個直接問句中，不含預設的疑問詞或選擇問句占 41.9%，其他問句句型預設從弱至強，依序為：正反問句占

表 3：CECC 記者會強勢型提問分配表

變項	變項值（次數，百分比）
主導性	
初步陳述（n=7921）	有（4486, 56.6%）／無（3435, 43.4%）
多個問題（n=3982）	單一問題（1523, 38.2%）／多個問題（2459, 61.8%）
追問（n=7921）	有（432, 5.5%）／無（7489, 94.5%）
直接性	
間接／直接問句（n=7921）	間接問句（3130, 39.5%）／直接問句（4791, 60.5%）
有無禮貌用語（n=7921）	有（4673, 59%）／無（3248, 41%）
假設性	
前導偏向（n=4486）	有（701, 15.6%）／無（3785, 84.4%）
直接問句預設（n=4791）	疑問詞或選擇問句（2009, 41.9%）／正反問句（1497, 31.2%）／語助詞問句（1014, 21.2%）／附加問句（88, 1.8%）／直述問句（183, 3.8%）
對抗性	
有無對立（n=7921）	有（1005, 12.7%）／無（6916, 87.3%）
是否為批判型問題(n=7921)	是（377, 4.8%）／否（7544, 95.2%）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31.2%、語助詞問句占 21.2%、附加問句占 1.8%、直述問句占 3.8%。進而，分析 2,553 個含前提之直接問句，本研究發現「直接問句預設」與「前導偏向」有顯著相關（$\chi^2(1)=20.59, p< .001$），即帶有預設的直接問句含前導偏向比例（22.1%）高於不帶預設的疑問詞或選擇問句（14.9%）。而且，唯有附加問句含前導偏向（53.8%）的比例高於未含前導偏向（46.3%），其他直接問句句型含前導偏向的比例皆低於未含者。

最後，就問題內容「對抗性」言之，對立問題約占一成二，批判型問題則僅占 4.8%。交叉分析顯示，此二者有顯著相關（$\chi^2(1)=128.03,$

p< .001）：對立問題使用批判型問題的比例（14.3%）高於無對立問題（3.4%），顯示對立問題較常出現在批判型問題中。

進而，針對本研究提出之 RQ1：「記者提問之『整體強勢性』各面向間是否有顯著差異？」，本研究透過相關分析發現，「主導性」與「假設性」（r=.134, p < .001）、「對抗性」（r=.195, p< .001）；「直接性」與「假設性」（r=.315, p< .001）皆有顯著正相關，表示問題的主導性越強，其假設性、對抗性也越強；問題的直接性越強，其假設性越強。此外，「假設性」與「對抗性」也有顯著正相關（r=.092, p< .001），即提問的假設性越強，其內容對抗性也越強。

不過，「直接性」與「主導性」（r=-.032, p< .01）、「對抗性」（r=-.106, p< .001）皆有顯著負相關，顯示問題直接性越高，其主導性與內容對抗性越低。對此，本研究先針對「直接性」與「主導性」各指標進行卡方分析。表 3 顯示，就「直接或間接問句」來看，其與「初步陳述」（χ^2(1)=55.30, p< .001）、「多個問題」（χ^2(1)=29.53, p< .001）、「追問」（χ^2(1)=9.04, p< .01）皆有顯著相關。其中，間接問句含初步陳述的比例（61.8%）高於直接問句（53.3%），顯示間接問句被用以減緩初步陳述的主導性。而直接問句出現在多個問題中的比例（82.7%）高於間接問句（77.8%），且用於追問的比例（6.1%）也略高於間接問句（4.5%），顯示直接問句與多個問題、追問常合併使用，增加記者提問的整體強勢性。

另方面，「有無禮貌用語」與「初步陳述」（χ^2(1)=131.20, p< .001）、「多個問題」（χ^2(1)=56.36, p< .001）、「追問」（χ^2(1)=15.28, p< .001）同樣有顯著相關（見表 4）。禮貌用語出現在含初步陳述的問題比例（62%）高於無禮貌用語（49%），顯示禮貌用語被用以降低初步陳述帶來的主導性。不過，禮貌用語在「多個問題」的

表 4：CECC 記者會提問「主導性」與「直接性」變項交叉分析（N=7921）

直接性 / 主導性	直接或間接問句			有無禮貌用語		
	間接（%）	直接（%）	χ^2	有（%）	無（%）	χ^2
初步陳述						
無	1197（38.2）	2238（46.7）	55.30***	1778（38）	1657（51）	131.20***
有	1933（61.8）	2553（53.3）		2895（62）	1591（49）	
多個問題						
單一	695（22.2）	828（17.3）	29.53***	1028（22）	495（15.2）	56.36***
多個	2435（77.8）	3963（82.7）		3645（78）	2753（84.8）	
追問						
無	2989（95.5）	4500（93.9）	9.04**	4457（95.4）	3032（93.3）	15.28***
有	141（ 4.5）	291（ 6.1）		216（ 4.6）	216（ 6.7）	

註：**表 p< .01，***表 p< .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比例（78%）低於無禮貌用語（84.8%），而禮貌用語出現在「追問」的比例（4.6%）也低於無禮貌用語（6.7%），皆顯示禮貌用語較少被用來減緩「多個問題」與「追問」帶來的主導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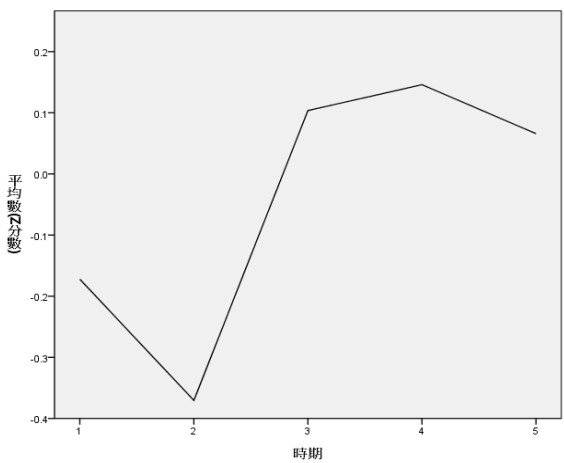
最後，本研究針對「直接性」在內容「對抗性」兩指標上進行 t 檢定。分析顯示，對抗性在「有無對立」（t(1315.75)=10.457, p< .001）、「是否為批判型問題」（t(7919)=2.502, p< .05）上皆有顯著差異：對立問題的「直接性」平均數為 0.39，低於無對立問題的 0.52；批判型問題的「直接性」平均數為 0.46，低於非批判型問題的 0.51。亦即，無論是對立或批判型問題，其直接性皆低於無對立或非批判型問題。

二、時期變化與提問強勢性、同業代問

就本研究蒐集的 3,982 個發言輪分析，本研究發現記者提問的問題數量在不同時期有顯著差異（F=47.33, p< .001）：「三級警戒」的一個發言輪中問題數最高（M=2.42），其次依序是「每日記者會」（M=2.0）、「二級警戒」（M=1.89）、「放寬防疫」（M=1.79）及「每週記者會」（M=1.58）。

而針對 RQ2：「不同『疫情發展時期』之記者提問在『整體強勢性』及其各面向上，是否有顯著差異？」，首先，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顯示不同時期的提問強勢程度有顯著差異（F=137.77, p< .001）。圖 1 顯示，「每日記者會初期」（M=-0.17）與「每週記者會」（M=-0.37）的

圖 1：強勢型提問強度之時期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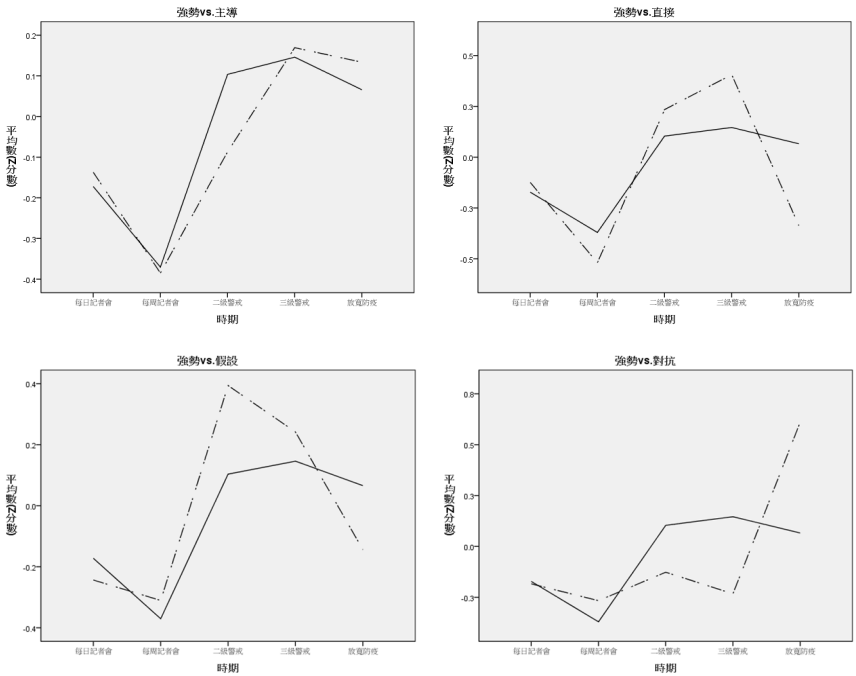
註：時期 1 至 5 依序代表每日記者會初期、每週記者會、二級警戒、三級警戒、放寬防疫。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提問強勢程度低於整體平均；「三級警戒」（*M*=0.15）、「二級警戒」（*M*=0.10）及「放寬防疫」（*M*=0.07）則皆高於整體平均。進一步透過 Scheffé 事後比較發現，「三級警戒」時期的提問強勢性明顯高於「放寬防疫」、「每日記者會初期」及「每週記者會」時期；「二級警戒」與「放寬防疫」明顯高於「每日記者會初期」及「每週記者會」時期。不過，「二級警戒」與「三級警戒」、「放寬防疫」無顯著差異。

其次，將強勢型提問與其四個面向分別比較，圖 2 顯示，「主導性」在二級警戒時期低於整體，但到了三級警戒，其強度略高於整體。

圖 2：強勢型提問與四面向強度之時期變化比較



註：「實線」表整體強勢型提問，「虛線」表主導、直接、假設、對抗性面向。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直接性」與「假設性」在二、三級警戒時期，其強度皆大於整體，但前者在「每週記者會」的強度低於整體，後者反之。不過，到了放寬防疫時期，前述兩面向的下降幅度皆大於整體。值得注意的是，問題內容「對抗性」在「每週記者會」的程度高於整體，在「二級警戒」與「三級警戒」時期皆低於整體，但到了「放寬防疫」時期，其不同於另三個面向，反而強度驟增，高於整體。

另外，對於 RQ3：「『同業代問』之問題在不同『疫情發展時期』之分布為何？以及其與『非同業代問』之問題整體強勢性是否有顯著差異？」首先，本研究發現，540 個「同業代問」問題在每日記者會初期，僅出現 2 個，每週記者會則無同業代問。不過，到了二級警戒期間，比例增至 23.5%，三級警戒則有 54.3%，即使到了放寬防疫期間，比例也有 21.9%。其次，表 5 顯示，是否為「同業代問」在強勢性上有顯著差異（$t(7919)=-11.28$, $p< .001$）：「同業代問」問題的強勢程度（$M=0.27$）高於整體平均，非同業代問的問題（$M=-0.02$）則略低於整體。進而就強勢型提問的四個面向分析，「同業代問」的問題無論在

表 5：提問強勢性與同業代問之 Z 分數平均數 *t* 檢定

	是否為同業代問		
	否（n=7381）	是（n=540）	*t* 值
整體強勢性	-0.02	0.27	-11.28***
主導性	-0.01	0.19	-5.02***
直接性	-0.03	0.36	-8.58***
假設性	-0.03	0.40	-8.25***
對抗性	-0.01	0.12	-2.55*

註：表格中「平均數」為標準化後 Z 分數之平均，代表距離總平均數的標準差單位；*表 $p< .05$，**表 $p< .01$，***表 $p< .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主導性」（$t(638.53)=-5.02$, $p< .001$）、「直接性」（$t(7919)=-8.58$, $p< .001$）、「假設性」（$t(595.95)=-8.25$, $p< .001$）或「對抗性」（$t(602.70)=-2.55$, $p< .05$）上，皆顯著高於非同業代問。

三、提問強勢性與問題功能、引述來源

本研究發現，記者提問之 7,921 個問題中，有 7,544 個問題具形式功能，其中有45.6% 為「索取新或具體資訊」，接著依序為「要求確認或澄清」（33%）、「要求評估或評論」（15.7%）、「要求態度陳述」（3.3%）及「要求建議」（2.4%）。而針對RQ4：「不同『問題功能』之記者提問在『整體強勢性』及其各面向上，是否有顯著差異？」表 6 顯示，首先，不同「問題功能」之提問在整體「強勢型提問」程度上有顯著差異（$F=46.21$, $p< .001$）：「要求態度陳述」（$M=0.289$）的整體強勢性最強，其次是「要求評估或評論」（$M=0.07$），而另三種功能平均數皆低於整體平均，其中又以「索取新或具體資訊」（$M=-0.081$）的整體強勢性最低。進一步透過 Scheffé 事後比較發現，「要求態度陳述」與其他四種問題功能；「要求評估或評論」與「索取新或具體資訊」、「要求確認或澄清」皆有顯著差異。

其次，不同「問題功能」在強勢型提問的四個面向上，也皆有顯著差異：「要求態度陳述」在四面向的平均皆高於整體平均；「要求評估或評論」則僅在內容「對抗性」上（$M=-0.152$）低於整體平均，顯示記者要求受訪者評估或評論時，主要非以對抗方式提問。此外，「索取新或具體資訊」與「要求確認或澄清」在四個面向的平均皆低於整體平均。「要求建議」在「直接性」（$M=-0.012$）與「對抗性」（$M=-0.193$）上低於整體平均，但在「主導性」（$M=0.023$）與「假設性」（$M=0.019$）上則高於整體平均，顯示記者要求受訪者給予建議時，其

表 6：提問強勢性與問題功能之 Z 分數平均數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索取新或具體資訊（n=3438）	要求態度陳述（n=249）	要求澄清或確認（n=2486）	要求評估或評論（n=1188）	要求建議（n=183）	*F* 值
整體強勢性	-0.081	0.289	-0.078	0.070	-0.041	46.21***
主導性	-0.041	0.393	-0.076	0.092	0.023	16.74***
直接性	-0.002	0.059	-0.032	0.103	-0.012	3.92***
假設性	-0.161	0.535	-0.017	0.238	0.019	62.60***
對抗性	-0.122	0.167	-0.187	-0.152	-0.193	13.59***

註：表格中「平均數」為標準化後 Z 分數之平均，代表距離總平均數的標準差單位；***表 $p < .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主導性與假設性較強。

另方面，針對 RQ5：「記者提問『有無引述來源』、『引述來源數量』在問題『整體強勢性』及其各面向上，是否有顯著差異？以及，引述之『消息來源類型』分布狀況為何？」表 7 顯示，問題「有無引述來源」的整體強勢性有顯著差異（$t(2034.69)=-18$, $p < .001$）：有引述來源的問題之強勢程度（$M=0.26$）高於整體平均，而無引述來源的問題（$M=-0.06$）則略低於整體。進而，就強勢型提問的四個面向分析，「有無引述來源」在「主導性」（$t(2535.58)=-22.53$, $p < .001$）、「直接性」（$t(7919)=13.5$, $p < .001$）、「假設性」（$t(1985.21)=-4.97$, $p < .001$）及「對抗性」（$t(1711.37)=-23.97$, $p < .001$）上，皆有顯著差異。其中，「主導性」、「假設性」及「對抗性」在有引述來源的問題上，其強度皆高於無引述來源的問題，但無引述來源的「直接性」高於有引述來源的問題。

不過，由於在本研究中，禮貌用語可能被歸在同一發言輪的其他問題，而直接問句也可能是包含在以間接問句作為第一個提問的「多個問

表 7：提問強勢性與引述來源之 Z 分數平均數 *t* 檢定

	有無引述來源		
	無（n=6412）	有（n=1509）	*t* 值
整體強勢性	-0.06	0.26	-18***
主導性	-0.11	0.47	-22.53***
直接性	0.07	-0.31	13.50***
假設性	-0.03	0.13	-4.97***
對抗性	-0.18	0.75	-23.97***

註：表格中「平均數」為標準化後 Z 分數之平均，代表距離總平均數的標準差單位；*表 $p< .05$，**表 $p< .01$，***表 $p< .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題」中，因而降低或提高分析結果的「直接性」。因此，為確定「有無引述來源」與「直接性」的關係，本研究將「直接性」的兩個指標分別與「有無引述來源」進行卡方分析。本研究發現，無論就整體（n=7921）、單一問題（n=1523），或「多個問題」的起始問題（n=2459）來看，「有無引述來源」與「間接／直接問句」（整體：$\chi^2(1)= 48.27, p< .001$；單一問題：$\chi^2(1)=26.73, p< .001$；「多個問題」的起始問題：$\chi^2(1)=7.72, p< .01$）及「有無禮貌用語」（整體：$\chi^2(1)= 197.80, p< .001$；單一問題：$\chi^2(1)=54.99, p< .001$; 「多個問題」的起始問題：$\chi^2(1)=68.99, p< .001$）皆有顯著相關。不過，就「多個問題」的後續問題（n=3939）來看，雖「有無禮貌用語」與「有無引述來源」有顯著相關（$\chi^2(1)=54.43, p< .001$），但「間接／直接問句」與「有無引述來源」卻無顯著相關（$\chi^2(1)=1.24, p=.266$）。

進而，將提問「引述來源」的數量相加，與強勢型提問及其四面向進行相關分析。本研究發現，引述來源數量與整體「強勢性」（$r=.210$,

p< .001）、「主導性」（*r*=.213, *p*< .001）、「假設性」（*r*=.057, *p*< .001）、「對抗性」（*r*=0.356, *p*< .001），皆有顯著正相關，即記者引述來源數量越多，該問題的整體強勢、主導、假設與對抗性便越強。不過，引述來源數量與「直接性」有顯著負相關（*r*=-.148, *p*< .001），即問題引述來源的數量越少，其直接性（使用直接問句與無禮貌用語）越強。

最後，在 1,509 個（占整體 19.1%）有引述來源的問題中，有 1,444 個消息來源被明確指出。其中被引述最多的是 CECC 記者會主持群，占 26.9%，其次占一成以上的消息來源分別為政府官員或民意代表（16.4%）、具名或未具名之醫師（14%）、一般民眾（10.8%）及專家學者（10.1%）。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疫情發展時期」與「有無引述來源」有顯著相關（$\chi^2(4)=766.34$, *p*< .001）。在各時期中，以「放寬防疫」時期引述來源的比例（50.7%）最高，其次是「每日記者會」（24.3%）、「三級警戒」（13.2%）及「二級警戒」（10.6%），而記者在「每週記者會」中引述來源的比例僅為1.3%，顯著低於其他時期。

四、提問內容主題與時期、強勢性、引述來源、同業代問

記者問題的「內容主題」可能包含一個以上，因此，不計 654 個延續前一個發言輪，以及 146 個被歸為「其他」之問題主題，本研究發現在 7,529 個主題中，「防疫舉措」（24.9%）為最多，其次依序為「防疫政策」（19%）、「本土疫情」（13.8%）、「染疫個案」（12.5%）、「疫情政治」（10.4%）、「防疫物資」（6.2%）、「醫療體系」（6.2%）、「醫學知識」（4.3%）及「宣傳溝通」（2.7%）。以下針對 7,529 個主題與其他變項進行交叉分析，以回答本研究提出之 RQ6：

「記者提問之『內容主題』在不同『疫情發展時期』、『整體強勢性』各面向、『有無引述來源』，以及『同業代問』上的分布狀況為何？」

（一）不同時期之內容主題變化

分析在個別時期中，提問內容主題比例超過兩成者，本研究發現，每日記者會初期聚焦於「染疫個案」（21.4%）與「防疫政策」（20%）；每週記者會時期為「疫情政治」（49.7%）；二級警戒時期為「防疫政策」（24.6%）、「防疫舉措」（21.2%）及「染疫個案」（20.1%）；三級警戒時期為「防疫舉措」（27.2%）與「防疫政策」（24.4%）；放寬防疫時期為「防疫舉措」（45.1%）。

此外，分析其他未在上述期間占比超過兩成的主題。本研究發現，雖「本土疫情」相關問題如前所述，約占所有主題的一成四，排名第三，但其多出現在每日記者會初期（28.2%）與三級警戒（28.6%）期間，而「每週記者會」乃因疫情趨緩而起，故此期間，記者提問本土疫情問題的數量也最低（0.8%）。類似的比例分布也發生在「防疫物資」問題上：其在每日記者會初期（31%）、三級警戒（29.9%）及放寬防疫（20%）期間，皆占兩成以上，出現在「每週記者會」的數量為最低（0.9%）。

而 COVID-19 相關「醫學知識」，包含病毒資料、病徵或如何判斷確診等問題，多出現在每日記者會初期（36.6%）及放寬防疫期間（29.2%）；與醫療市場及醫療量能相關之「醫療體系」問題多出現在三級警戒（28%）與放寬防疫期間（40.7%），尤其後者特別聚焦於民眾就醫相關問題。最後，「宣傳溝通」問題多出現在每日記者會初期（32.7%）與放寬防疫期間（43.4%），尤其前者偏重防疫宣傳問題，後者偏向記者會本身與官員個人問題。

（二）內容主題與強勢提問四面向、引述來源、同業代問

將內容主題與強勢提問的四面向指標進行交叉分析，本研究發現，首先，就「主導性」言之，（1）僅有「染疫個案」使用「初步陳述」的比例（49.7%）略低於無使用（50.3%），其他主題使用「初步陳述」的比例皆高於無使用；（2）除了「宣傳溝通」使用「多個問題」（43.9%）的比例低於「單一問題」（56.1%），其他主題使用「多個問題」的比例皆約五、六成，高於「單一問題」；（3）所有主題的「追問」比例皆低於一成，其中「疫情政治」與「防疫舉措」的追問比例較高，各為 6.8%。

其次，就「直接性」來看，（1）所有主題使用「直接問句」的比例約占五、六成，皆高於「間接問句」，其中又以「防疫政策」（62.1%）及「醫療體系」（61.9%）較高；（2）所有主題的「有禮貌用語」比例約占五至七成，皆高於「無禮貌用語」，其中「宣傳溝通」使用禮貌用語的比例（74.6%）尤高於無使用。

其三，就「假設性」分析，（1）含前提的 4,486 個問題中有 4,240 個分析主題，其「有前導偏向」比例僅約占一至二成，遠低於「無前導偏向」，且其中僅「防疫政策」（21.4%）與「防疫物資」（20.5%）略高於兩成；（2）在 4,791 個使用直接問句的問題中，共有 4,185 個分析主題，其中除了「本土疫情」（49.1%）低於五成，其他主題的「直接問句預設」比例約占五至六成，高於「無直接問句預設」。

其四，針對內容「對抗性」，（1）雖然所有主題的「內容對立」比例皆在兩成五（含）以下，低於無對立，但「染疫個案」（6.5%）與「醫學知識」（7.4%）的占比不到一成，而「醫療體系」（25%）與「宣傳溝通」（24.4%）的比例則高於兩成。其中，「醫療體系」的內容對立聚焦於民眾求診或就醫問題，「宣傳溝通」則偏重記者會延遲或

變更等問題；（2）所有主題的「批判型問題」比例皆不到一成，遠低於非批判型問題，而其中比例較高者為「防疫舉措」（6.9%）與「醫療體系」（6.9%），前者聚焦於檢測或隔離問題，後者同樣側重於民眾求診或就醫情況。

最後，記者在問題中引述來源比例最高的主題是「防疫舉措」（34%），其他占比一成以上的主題包含「防疫政策」（18.1%）、「疫情政治」（13.4%）及「本土疫情」（12.9%），而「宣傳溝通」引述來源的比例最低，僅 4.2%。另方面，請同業代問的問題，多聚焦於「防疫舉措」（28%）、「防疫政策」（17.7%）與「本土疫情」（14%），其他主題類別占比不到一成，其中同樣以「宣傳溝通」（2.3%）請同業代問的比例最低。

伍、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針對因 COVID-19 疫情而起，自 2020 年 1 月 22 日開始，歷時約兩年半的 CECC 例行記者會，透過內容分析法，研究記者在跨越不同疫情時期的「強勢型提問」程度，以及其與問題功能、內容主題、引述來源及同業代問的關係，探究記者如何發揮新聞的看門狗功能，也藉此彌補本土政治記者會相關研究數量不足的問題。

不同於之前研究，本研究以 CECC 記者會隔天的三大報頭版相關新聞作為取樣標準，因若三大報同時將 CECC 記者會當成頭版新聞之主要消息來源，表示該記者會具高度新聞價值，更能藉此一窺記者提問的專業規範偏向，以及監督政府力道之變化。此外，本研究蒐集 214 場 CECC 記者會，劃分出 3,982 個發言輪，共 7,921 個問題，此分析量也超越過去研究。

一、主要研究發現與討論

以下分別針對本研究提出之六大研究問題，說明主要研究發現並進行相關討論。第一，就強勢型提問的四個面向來看：（1）「主導性」中，使用「初步陳述」與「多個問題」的比例高於「無初步陳述」與「單一問題」。放在 CECC 記者會脈絡中來看，記者因透過「初步陳述」提供較多背景資訊，故常依此發展「多個問題」，使得這兩個提問策略出現的頻率較高。而且，雖 CECC 記者會主持人並未限制記者提問次數，但在實務上，記者偏向將所有問題一次道出（約六成一的提問發言輪包含兩個以上問題），既避免需要再與其他記者競爭提問機會，也方便爭取時間撰寫新聞；（2）「直接性」中，使用「直接問句」的比例高於「間接問句」，但前者使用「禮貌用語」的比例低於後者，也因此提高問題的直接性。值得說明的是，在本研究中，直接問句出現在含兩個以上問題之發言輪的比例高達八成三，而禮貌用語可能被包含在同一發言輪的其他問題中，故高估了直接問句未含禮貌用語的比例。不過，即使就僅含單一問題的 1,523 個發言輪來看，直接問句無禮貌用語的比例還是顯著高於間接問句；（3）「假設性」中，含初步陳述的問題僅約一成五有陳述偏向，但直接問句使用含預設句型的比例約占五成八。不過，這些在問題形式上有偏向或預設的提問，其內容卻不一定不利於受訪者，例如：「因為今天有新聞出來說，部長好像已經一夜沒有睡覺了。大家都很關心這個，部長還有官員們的身體怎麼樣，可不可以簡單幫我們講一下目前還好嗎？」（CECC 記者會，2020 年 2 月 4 日）；（4）針對內容「對抗性」，記者使用對立（12.7%）或批判型問題（4.8%）的比例不高，顯示記者偏向在不易被看見的提問「形式」上

展現強勢性，而非透過問題「內容」直接對抗 CECC 記者會主持人／群，也藉此避免公開衝突。

此外，本研究發現「直接性」與「主導性」、「對抗性」呈現顯著負相關，表示提問的直接性越高，其主導性與內容對抗性越低。不過，詳細分析可知，直接性的「間接問句」與「禮貌用語」被用來降低「初步陳述」的主導性。而「直接問句」則有較高比例與「多個問題」、「追問」合併使用，增加記者提問的整體強勢性。至於「禮貌用語」，其出現在「多個問題」與「追問」的比例顯著較低，顯示此兩者的主導性較少被禮貌用語所減弱。另方面，對立或批判型問題的直接性皆低於無對立或非批判型問題，顯示記者偏向使用「間接問句」及「禮貌用語」降低提問內容展現出來的對抗性。

第二，本研究發現「三級警戒」的個別發言輪中問題數量最多，其次依序是「每日記者會初期」、「二級警戒」、「放寬防疫」及「每週記者會」。如前所述，在 CECC 記者會情境中，記者一般偏向把握被點到提問的機會，將所有問題一次問完，故這也顯示在疫情爆發初期（每日記者會初期），以及疫情緊張與嚴峻的時刻（三級、二級警戒時期），CECC 記者會成為記者向 CECC 這權威消息來源取得新聞的重要管道。進而，就提問強勢程度來看，在疫情前期的「每日記者會初期」及「每週記者會」時期，記者提問的強勢程度低於整體平均，且強勢程度與疫情嚴重程度成正比：「三級警戒」的強勢程度最高，「二級警戒」次之。這顯示在 COVID-19 疫情對社會造成重大衝擊時，記者傾向採取較強勢的提問策略，實踐「看門狗」的監督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疫情減緩的「放寬防疫」時期，提問的強勢程度依然高於整體平均，顯示記者的監督力道具備某種持續性，並未隨疫情緩解而立即消退。進而分析強勢型提問的四個面向，本研究發現內

容「對抗性」強度與整體提問強勢度發展相反：其在「放寬防疫」時期最高，其次依序為「二級警戒」及「三級警戒」。而「放寬防疫」時期的提問主題最大宗為「防疫舉措」（45.1%），比例遠高於排名第二、三的「本土疫情」（15.9%）及「防疫政策」（13.1%），顯見到了「放寬防疫」時期，記者對於涉及防疫舉措改變、本土疫情發展或防疫政策修改等相關問題，反而傾向使用在內容上明顯對立或批判的問題。對此，本研究推測有兩個可能原因：（1）到了疫情後期，社會關注的焦點從之前的「危機警戒與應變」轉為「回歸常態的評估」，故記者聚焦於本土疫情發展，以及隨之而來的防疫舉措要何時與如何放寬、防疫政策的改變等問題。而 CECC 作為統籌防疫工作的決策核心，在記者會中自然成為記者代替公眾質問的對象，使得提問內容展現出更強的對抗性；（2）到了「放寬防疫」時期，記者與主持人／群在 CECC 記者會上的互動已歷時兩年有餘，熟悉主持人／群的回應方式與習慣，能了解甚麼樣的問題較不會引發負面反應。因此，記者更能針對議題，設計內容對抗性較強，卻能避免衝突的問題。

第三，本研究參考文獻（陳秀鳳、劉蕙苓，2024）與 CECC 個案資料，納入之前研究未曾探析的新變項「同業代問」，發現其逾五成出現在「三級警戒」，「二級警戒」與「放寬防疫」時期也各占兩成多。此類問題主題同樣聚焦於「防疫舉措」、「防疫政策」與「本土疫情」，且其整體強勢程度高於非同業代問之問題。事實上，根據過去文獻（江靜之，2013；Clayman & Heritage, 2002a），記者在公開訪問中，常以公眾代言人自居或引述他人之言，藉此型塑中立立場並轉嫁發言責任。循此邏輯，記者請「同業代問」固然可以避免自己遭受網友批評（陳秀鳳、劉蕙苓，2024），但對代問的記者來說，在提問前先說明自己代媒體同業提問，表示提問責任並不在己，同時也提高此類問題的強勢程

度。

第四，就提問功能言之，「索取新或具體資訊」與「要求確認或澄清」共占近七成九，顯示記者提問多聚焦事實問題，且此二者的提問強勢性低於整體平均。反之，當記者提問涉及尋求受訪者個人態度、意見或評論，提問強勢性也隨之提高，其中又以「要求態度陳述」的提問強勢性最強。換言之，或許「要求評論」等涉及詢問受訪者個人意見或態度的問題，提供受訪者模糊回答的彈性空間（Jiang, 2006），但在 CECC 記者會中，記者偏向以強勢型提問促使受訪者表態或評論，等於提高此類問題的挑戰程度。

第五，約一成九的提問有引述來源，其強勢程度顯著高於整體平均。而且，記者在問題中引述的來源數量越多，該問題的整體強勢、主導、假設與對抗性也越強。這顯示記者傾向透過引述消息來源，一來展現自己強勢提問有所根據，二來如前所述，可藉此保持中立，故較無懼強勢提問。值得注意的是，無引述來源的提問，其「直接性」顯著高於有引述來源者，且就引述來源數量來看，其與「直接性」呈現顯著負相關，即提問的直接性越強，引述來源越少。不過，考量「直接性」的兩個指標（間接／直接問句、有無禮貌用語），可能因本研究以個別問題作為分析單位，忽略發言輪語境的影響，故本研究再透過卡方分析檢視，發現僅在「多個問題」的後續問題中，「間接／直接問句」與「有無引述來源」無顯著相關。

此外，有引述來源的提問，其主題聚焦於「防疫舉措」、「防疫政策」、「疫情政治」及「本土疫情」，且引述最多的來源是 CECC 記者會主持群（26.9%）。本研究認為，這一來因 CECC 記者會主要由相關主管機關的官員主持，而其在 COVID-19 相關新聞上，原本便是權威消息來源。二來記者的部分問題會與記者會開場內容有關（Aguila

Sánchez et al., 2021）或進行追問，故記者也會引述主持群的當天發言。進而，就三級警戒期間來看，雖然梁志鳴等（2024）發現記者提問的問題有 49% 提及消息來源，但在本研究中，卻僅有 10.9% 的問題有提及消息來源。本研究認為此落差主要來自抽樣架構的不同：本研究以登上隔天三大報頭版新聞的 CECC 記者會作為抽樣根據，選取之樣本新聞性較高，這可能使得記者較無須引述來源正當化提問，抑或針對記者會當天主題或議題提問，無須引述其他消息來源。

第六，在內容主題上，本研究發現占比逾一成的主題依序為「防疫舉措」、「防疫政策」、「本土疫情」、「染疫個案」及「疫情政治」。就不同時期來看，「疫情政治」多出現在每週記者會期間，而「防疫政策」的制定、內容與改變等，則是記者在每日記者會初期，以及二、三級警戒期間的提問重點之一。此外，「染疫個案」相關細節是每日記者會初期與二級警戒期間的關注焦點，而「防疫舉措」是從疫情最嚴重的二、三級警戒，一直到之後放寬防疫期間的另一主要提問內容。從上可見，無論是在疫情初期或嚴峻時刻，記者的提問始終環繞在當時民眾最關心的疫情發展、染疫個案情況，以及對應的防疫政策與舉措，在政府與民眾之間，實質扮演資訊傳遞與溝通之橋樑。

另外，就主題與強勢提問四面向來看，所有主題使用「初步陳述」、「多個問題」、「直接問句預設」及「直接問句」的比例多超過五成，僅有「染疫個案」在「初步陳述」、「本土疫情」在「直接問句預設」，以及「宣傳溝通」在「多個問題」上例外。針對上述例外，本研究推測主因如下：（1）「染疫個案」因細節主要源於 CECC，且編有案號，記者無須再鋪陳或確定提問背景，故較其他主題更少使用「初步陳述」；（2）在「本土疫情」議題上，記者有約五成的問題是「要求具體或新資訊」，即涉及 5W1H 的事實問題，故偏向使用不帶預設的

疑問詞問句，致使「直接問句預設」比例較其他主題低；（3）「宣傳溝通」主題包含防疫宣傳、記者會本身及主持記者會官員的個人問題，因其內容多較為單純，例如：「……指揮中心這邊是不是還是呼籲說，民眾先不要這樣子做？」（CECC 記者會，2021 年 7 月 15 日），故無須提問「多個問題」。

二、研究貢獻、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除了個案資料橫跨不同疫情時期、資料量較以往相關研究龐大，以及上述研究結果貢獻之外，本研究的理論貢獻有二：（1）如本研究之前所述，由於記者提問是複雜的語言行動，問題的整體強勢性並非反映某些潛在特質，如主導性、直接性、假設性或對抗性，而是在不同情境下的差異化使用。或許也因如此，過去研究多將提問強勢性的四個面向分而論之。不過，本研究同時分析提問的整體強勢程度與其包含的四個面向，並進而發現指標效果相互抵銷的情況，凸顯記者在執行「看門狗」功能時，運用提問策略的靈活與多樣性；（2）本研究發現在 COVID-19 疫情特殊情境中，不同疫情發展時期、提問功能、問題主題、消息來源引述及同業代問，皆會影響記者的提問強勢性，是未來研究可納入考量的重要情境因素。

進而，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與討論，提出兩點新聞實務建議：第一，提問策略的多元性讓記者得以在執行「看門狗」功能的同時，降低提問強勢性，避免破壞與受訪者的關係。例如在追問時使用禮貌用語，或提問多個問題時，以間接問句作為發言輪的起始問題。第二，「引述消息來源」與「同業代問」既能形塑提問記者的中立立場，也能支持記者的強勢提問，故此二者或可成為輔佐強勢提問的策略。

當然，本研究也有研究限制。首先，本研究以個別問題作為分析單位，無法捕捉同一發言輪中多個問題間的相互影響，也無法探究個別問題的意義或強勢程度如何因之改變。因此，建議未來研究可搭配對話分析法，探究同一發言輪中多個問題的語用連結及意義變化。其次，記者會主持人是記者提問的重要情境，會直接影響記者的發言及提問強勢性等。由於 CECC 記者會大多採取「主持群」，而非單一主持人模式，本研究的分析架構無法有效處理此情境變項。因此，建議之後研究可將之納入考量，探究其與記者提問強勢性的關係。第三，本研究雖透過文獻檢閱與 CECC 個案，建立強勢型提問分析架構，並經過前測，但在實際過錄與分析上，本研究發現以下值得討論之問題：（1）在 CECC 記者會中，許多議題涉及專業的醫學或公衛領域，記者常須透過「前提陳述」說明或正當化問題。同時，記者也會因應新聞實務需求（如節省提問時間、在記者會上同時發稿等），偏向在單一發言輪中提問「多個問題」。換言之，這些提問策略可能是因應特定情境需求而生，不一定用以展現提問的強勢性。因此，未來研究或可針對不同記者會特性，探討「前提陳述」及「多個問題」作為強勢型提問指標的適用性；（2）雖記者在 CECC 記者會中可以追問，但其「追問」若非緊接著前一個問題，則該追問帶來的「主導性」將會減弱，尤其非立即「追問」的記者，常同時使用「不好意思」、「謝謝」等禮貌用語。因此，建議未來研究可採用 Clayman & Heritage（2009）的原來定義：「同一記者之後提問之問題」；（3）「前導偏向」的判斷易受問題內容之影響，無法清楚區分問題形式與內容。事實上，Clayman et al.（2006）定義此項指標時，便已混合問題形式與內容，這可從其包含「對受訪者無害」與「對受訪者不利」兩個選項中看出。而且，本研究也發現，有些問題的前導偏向雖具「假設性」，但就內容言之，卻反而有利受訪者回答，例

如：「現在因為春節期間是一樣維持二級，可是現在很多民眾他們是自主就升了三級，都是待在家。那部長之前有講過說，不用特別減少返鄉。那會不會想要跟大家呼籲一下說，其實不用那麼緊張。」因此，建議未來研究可考慮將之移至內容「對抗性」，並增設「有利受訪者」的反向數值，以捕捉「對抗性」的兩極特徵。

最後，雖 CECC 記者會也屬於政治記者會，可提供我們分析記者在臺灣政治記者會中提問的強勢性，一探臺灣新聞專業規範之傾向，但不可否認的是，CECC 記者會依然有其特殊性：（1）其不同於一般由國家元首、總統府或外交部官員主持，聚焦於國家政策、政治議題或危機的政治記者會。從此推論，CECC 例行記者會的提問強勢性應低於一般政治記者會；（2）CECC 例行記者會至陳時中正式卸下記者會主要主持人角色，歷時約兩年半。其間除了疫情發展狀況，記者會直播平臺的網友留言及記者資歷（陳秀鳳、劉蕙苓，2024）、記者會主持人的發言風格（例如是否會打斷記者發問、評論或責備記者提問）和其累積的知名度，以及記者與記者會主持群的關係或互動方式（例如是否提供私下訪問機會）等，皆可能影響記者在記者會上的提問強勢程度，以及其如何實踐新聞的看門狗功能。未來研究記者會上的記者提問強勢性，建議可輔以質性方法，了解記者面臨的複雜訪問情境與其因應不同情境而起的提問策略。

參考書目

江靜之（2003）。〈廣播新聞專訪之問句句型與功能初探〉，《新聞學研究》，76，155-186。

江靜之（2009）。〈廣電新聞訪問之機構情境與訪問設計〉，《新聞學研究》，99，119-168。https://doi.org/10.30386/MCR.200904_(99).0004

江靜之（2013）。〈多對一電視政治新聞專訪之對話分析研究〉，《新聞學研究》，117，89-134。https://doi.org/10.30386/MCR.201310_(117).0003

周葆華（2013）。〈從「後台」到「前台」：新媒體技術環境下新聞業的「可視化」〉，《傳播與社會學刊》，25，35-71。https://doi.org/10.30180/CS.201307_(25).0004

陳秀鳳、劉蕙苓（2024）。〈社群參與下的記者會傳播情境：記者專業實踐的困境與因應策略〉，《傳播研究與實踐》，14(1)，41-84。https://doi.org/10.53106/222114112024011401002

梁志鳴、陳思安、李韶曼、蔡君宜（2024）。〈Covid-19 疫情下的風險溝通與公共問責：三級警戒期間我國政府每日防疫記者會記者提問之主題分析〉，《醫藥、科技與法律》，29(1)，37-98。

戴淨妍（2023）。《「新冠記者會」中的疫情政治學：記者提問主題、框架與策略分析》。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https://doi.org/10.6342/NTU202301124

Aguila Sánchez, J. C., Llano Guibarra, N. I., & Pereyra-Zamora, P. (2021). Media agenda and press conferences on COVID-19 in Mexico: An analysis of journalists' ques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8*(22), 12067. https://doi.org/10.3390/ijerph182212067

Banning, S. A., & Billingsley, S. (2007). Journalist aggressiveness in joint versus solo presidential press conferences. *Mas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0*(4), 461-478. https://doi.org/10.1080/15205430701580672

Bhatia, A. (2006).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political press conferences. *Discourse & Society*, *17*(2), 173-203.https://doi.org/10.1177/0957926506058057

Clayman, S. E., & Heritage, J. (2002a). *The news interview: Journalists and public figures on the ai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layman, S. E., & Heritage, J. (2002b). Questioning presidents: Journalistic deference and adversarialness in the press conferences of U.S. presidents Eisenhower and Reag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2*(4), 749-775. https://doi.org/10.1111/j.1460-2466.2002.tb02572.x

Clayman, S. E., Elliott, M. N., Heritage, J., & McDonald, L. L. (2006). Historical trends in questioning presidents, 1953-2000.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36*(4), 561-583. https://doi.org/10.1111/j.1741-5705.2006.02568.x

Clayman, S. E., Heritage, J., Elliott, M. N., & McDonald, L. L. (2007). When does the watchdog bark? Conditions of aggressive questioning in presidential news conferenc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2*(1), 23-41. https://doi.org/10.1177/000312240707200102

Clayman, S., & Heritage, J. (2009). Question design as a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window into president-press relations. In M. Haakana, M. Laakso, & J. Lindström (Eds.), *Talk in interaction: Comparative dimensions* (pp. 299-315). Finnish Literature

Society.
Clayman, S. E., Elliott, M. N., Heritage, J., & Beckett, M. K. (2010). A watershed in White House journalism: Explaining the post-1968 rise of aggressive presidential new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7*(3), 229-247. https://doi.org/10.1080/10584609.2010.496712
Craig, G. (2016). *Performing politics: Media interviews, debates and press conferences*. Polity Press.
Du, X., & Rendle-Short, J. (2016). Journalist questions: Comparing adversarialness in Chinese political press conferences. *Discourse, Context and Media*, *12*, 51-58. http://dx.doi.org/10.1016/j.dcm.2016.02.002
Ekström, M. (2006). Interviewing, quot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news journalism: a study of the Swedish press 1915-1995. In M. Ekström, K. Åsa & N. Mats (Eds.), *News from the interview society* (pp. 21-48). Nordicom.
Ekström, M. (2009). Power and affiliation in presidential press conferences: A study on interruptions, jokes and laughter.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 *8*(3), 386-415. https://doi.org/10.1075/jlp.8.3.03eks
Ekström, M. & Eriksson, G. (2018). Press conferences. In R. Wodak, & B. Forchtner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 (pp. 342-354). Routledge.
Eriksson, G. (2011). Follow-up questions in political press conferences. *Journal of pragmatics*, *43*, 3331-3344. https://dx.doi.org/10.1016/j.pragma.2011.07.004
Eshbaugh-Soha, M. (2012). The politics of presidential press conferences.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41*(3), 471-497. https://doi.org/10.1177/1532673X1246245
Eshbaugh-Soha, M. (2013). Presidential influence of the news media: The case of the press conferenc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30*(4), 548-564. https://doi.org/10.1080/10584609.2012.737438
Gobeil, J. M. (2010). *Conditions of aggressiveness in US presidential and UK prime minister news conferences, 2002-2009* [Master thesis,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https://etda.libraries.psu.edu/catalog/11503
Godler, Y., & Reich, Z. (2013). How journalists "realize" facts: Epistemology in practice at press conferences. *Journalism Practice*, *7*(6), 674-689. https://doi.org/10.1080/17512786.2013.791067
Heritage, J. & Clayman, S. E. (2010). *Talk in action: Interaction, identities and institutions.* Wiley-Blackwell.
Hualpa, L. d. V. (2012). *The presidential news conference: Press-state relations in action*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https://escholarship.org/uc/item/8b71d751
Jiang, X. (2006). Cross-cultural pragmatic differences in US and Chinese press conferences: The case of the North Korea nuclear crisis. *Discourse & Society*, *17*(2), 237-257. https://doi.org/10.1177/0957926506060249
Jacobs, G. (2011). Press conferences on the internet: Technology, mediation, and access in

the news. *Journal of Pragmatics*, *43*, 1900-1911. https://doi.org/10.1016/j.pragma.2010.09.019

Scacco, J. M., & Wiemer, E. C. (2019). Press conferences.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Journalism Studies*, 1-7. https://doi.org/10.1002/9781118841570.iejs0264open_in_new

Smith, C. (1990). *Presidential press conferences: A critical approach*. Praeger.

Sun, T. (2010). Adversarial questioning and answering strategies in Chinese government press conferences. *Taiw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8*(2), 131-162. https://doi.org/10.6519/TJL.2010.8(2).5

Wu, F., & Zhao, H. (2016). How to respond to journalists' questions? A new perspective on Chinese premiers' aggressiveness at press conferences (1993-2015).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6*(5), 446-465. https://doi.org/10.1080/01292986.2016.1192210

Wu, F., Cheng, Y., & Chao, D. (2017). Global questioners: Examining journalists' aggressiveness at Chinese premiers' press conferences (1993-2015).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7*(4), 357-377. https://doi.org/10.1080/01292986.2017.1281322

Wu, F., & Zhang, J. (2018). Aggressiveness in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s' responses to journalists during press conferences, 1996-2016.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2*, 2503-2526.

Yi, Y. (2016a). The structural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premier's press conference: A study in institutionalization.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6*(3), 223-239. https://doi.org/10.1080/01292986.2015.1130158

Yi, Y. (2016b). Information control and political impression management: A dramaturgical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premier's press confer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0*, 5473-5493.

Yi, Y., & Chang, T.-K. (2012). Institutionalizing public relations in China: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premier's press conference.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38*(5), 711-722. https://doi.org/10.1016/j.pubrev.2011.12.007

Zhang, D., & Shoemaker, P. J. (2014). Foreign reporters' aggressiveness and Chinese officials' openness at news conferences: Influences on foreign media coverage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7*(1), 106-125. https://doi.org/10.1080/17544750.2013.844191

Journalism as a Watchdog during the Pandemic: Analysis of Journalistic Aggressiveness at Taiwan's CECC COVID-19 News Conferences

Chin-Chih Chiang*

ABSTRACT

Press conferences have been regarded by governments as a key mechanism for communicating policies to the public ever since the 20th century. They also function as an institutionalized forum through which journalists hold political actors accountable by questioning them about their actions and policie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particular, official press conferences not only provided an effective channel for authorities to communicate directly with the public, but also enabled journalists to ask government employees questions on behalf of the public, thereby taking on a watchdog role of the news media. These press conferences provide a valuable opportunity for researchers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ress and to analyze how journalists shift between competing professional norms of objectivity and adversarialness.

To explore how journalists in Taiwan fulfilled their watchdog role during daily Central Epidemic Command Center (CECC) press conferences across different phases of the pandemic, this research adopts the aggressive questioning framework of Clayman and Heritage (2009). Building on a literature review, it further modifies the framework in light of Mandarin Chinese's lingui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institutional context of CECC press

* Chin-Chih Chiang is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mail: morecc@nccu.edu.tw.

conferences in Taiwan. Employing content analysis to examine journalists' use of aggressive questioning strategies and their levels of intensity, this study also incorporates variables including source attribution in journalists' questions, delegated questions, question functions, and topics. Based on these dimensions, six research questions are proposed as follows.

RQ1: Are th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the dimensions of journalists' aggressive questioning?

RQ2: Are th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journalists' aggressive questioning and its dimensions across different phases of the pandemic?

RQ3: What is the distribution of delegated questions across different phases of the pandemic? Are th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journalists' aggressive questioning between delegated and non-delegated questions?

RQ4: Are th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journalists' aggressive questioning and its dimensions across different question functions?

RQ5: Are th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journalists' aggressive questioning and its dimensions between questions with and without source attribution? Is there a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evel of source attribution and journalists' aggressive questioning?

RQ6: What is the distribution of question topics across different phases of the pandemic?

This study collects data from a total of 214 daily CECC press conferences held between January 22, 2020 and July 17, 2022 that were selected by Taiwan's three major newspapers as sources for the following day's front-page news articles. This enables the analysis to target journalists' questions exhibiting significant newsworthiness.

For RQ1, correlation analysis reveals that initiative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s with assertiveness and adversarialness, and that directness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s with assertiveness. Assertiveness positively correlates with adversarialness, whereas directness negatively correlates with both initiative and adversarialness.

For RQ2, one-way ANOVA result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ggressive questioning across pandemic phases. The level of aggressive questioning during the “initial daily news conference” period and the “weekly press conference” period is below average, but above average during the “Level 3 alert”, “Level 2 alert”, and “relaxed restrictions” periods.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four dimensions of aggressive questioning shows that initiative is below the overall mean during the “Level 2 alert” period, but slightly above the overall mean during the “Level 3 alert” period. Both directness and assertiveness are above the overall mean during the “Level 2 alert” and “Level 3 alert” periods, however, directness is below the overall mean during the “weekly press conference” period, whereas assertiveness shows the opposite pattern. During the “relaxed restrictions” period, both those two dimensions decline more sharply than aggressive questioning. Finally, adversarialness is above the overall mean during the “weekly press conference” period and below the overall mean during the “Level 2 alert” and “Level 3 alert” periods. In contrast to the other three dimensions, it increases sharply during the “relaxed restrictions” period and is above the overall mean.

For RQ3, among the 540 delegated questions analyzed, only two occurred during the “initial daily news conference” period and none were observed during the “weekly press conference” period. However, the proportion of delegated questions increased to 23.5% during the “Level 2 alert” period and 54.3% during the “Level 3 alert” period. Even during the “relaxed restrictions” period, the proportion remained at 21.9% of delegated questions. The level of aggressive questioning differs significantly between delegated and non-delegated questions, with the former exhibiting above-average levels and the latter showing below-average levels.

For RQ4,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ppear in aggressive questioning across question functions. “Requests for attitude statements” exhibit the highest level of aggressive questioning, followed by “requests for evaluation or comments”, whereas the other three functions are below the overall mean. The four dimensions of aggressive questioning differ significantly across question functions. “Requests for attitude statements” are above the overall mean in all four dimensions. “Requests for evaluation or comments” are below the overall mean only in adversarialness. Both “requests for new or specific information” and “requests for confirmation or clarification” are below the overall mean across all four dimensions. By contrast, “requests for suggestions” are below the overall mean in directness and adversarialness, but above the overall mean in initiative and assertiveness.

For RQ5,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re in aggressive questioning between questions with and without source attribution. Questions with source attribution exhibit above-average levels, whereas those without source attribution are slightly below the overall mean. Across the four dimensions, initiative, assertiveness, and adversarialness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questions with source attribution than in those without it, whereas directness is higher in questions without source attribution than in those with it. The number of source attributions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 with both aggressive questioning and three of its dimensions (initiative, assertiveness, and adversarialness). By contrast, that number significantly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s with directness, indicating that questions with fewer source attributions tend to be more direct, as reflected in the use of direct questions and the absence of politeness markers.

For RQ6, the question topics consist mainly of “pandemic control measures”, “pandemic policies”, “domestic COVID-19 situation”, “COVID-19 cases”, and “pandemic politics”. “Pandemic policies”, including policy formulation, substance, and change, constitute one of the main focuses of

journalists' questions during the "initial daily news conference" period as well as the "Level 2 alert" and "Level 3 alert" periods. "Pandemic politics" appears more frequently during the "weekly press conference" period.

Keywords: content analysis, COVID-19 news conference, journalistic questions, aggressive questioning, adversarialness